

第一 部分

再思母職論述

Chapter 1

書寫／母職—— 以艾莉絲·沃克為例

游素玲 著

摘 要

長久以來，在西方傳統父權文化裡，母職和女性的文學創作一直被視為是格格不入的。亦即在二元思想體系下所呈現的母職與創作、母親與創作者身分、孩子和書籍總是相互對立的。然而，在此傳統的性別意識型態下，仍然有些女性作家不斷地透過書寫，挑戰並重新定義母職。其中，艾莉絲·沃克這位曾獲普立茲獎的非裔美國女作家的創作生涯代表了一位女作家尋求母職身分認同的最佳寫照。她的母職經驗和其作品反映出20世紀黑人女作家與母職的衝突與矛盾。沃克的小說內容往往與社會和歷史相關，也因此她的小說描繪出主流社會對黑人母親的限制，身為母親的黑人女性如何受到種族與性別雙重歧視。本文將闡述她的母職經歷如何形塑其對母職的觀感和個人的創作生涯。沃克早期的作品《美麗蒂安》（*Meridian*）記錄了她處在母職與自我生涯規劃之間的衝突與矛盾的心情。透過美麗蒂安對母職傳統慣例的反抗，以及她另類母親的行為，沃克企圖挑戰黑人母職傳統的規範。她顯然沒有大力讚揚母親的偉大，因為她並不認可將母職浪漫化的意識型態，同時，她也不認為女性的自我建構僅僅來自於養育孩子以及對孩子的渴望。相反地，沃克挑戰單一的母職論述，進而呈現多元的黑人母職經驗。在她書寫《紫色姊妹花》時，沃克對母職有了更深一層的體認，她逐漸發現了「母職」對她的創作帶來的可能性及正面意義，沃克指出她仰賴女兒的存在以從事創作，並將她的成功之作《紫色姊妹花》歸功於她和女兒間的互動，因此，她為母職開闢了一項新的觀點，駁斥母職與創作間存在必然衝突的傳統。

關鍵字 母職、書寫、艾莉絲·沃克

一 前言

長久以來，在西方傳統父權文化裡，母職和女性的文學創作一直被視為是格格不入的。亦即在二元思想體系下所呈現的母職與創作、母親與創作者身分、孩子和書籍總是相互對立的。相對於女性的生育功能長期以來不斷的被利用，女性發言跟寫作的權利也同樣被父權所剝奪。對於母性的提倡也跟女性被剝奪的創作權力經常有所呼應。對作家而言，將母性與創作聯結在一起絕不是新的構想，而且作家們經常把他們的作品比喻為自己的孩子。然而，當作家碰巧是女性，這兩個詞彙便突然產生對立。對女人而言，母親身分與創作無法並存，因為傳統觀念認為既然女人終究要成為母親，她們就無法、也不必創作。因此，女人只被鼓勵發展她們的母性，因為這是女人唯一被認可的創作形式。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甚至認為女人不具有創作的潛能，因為她們的所有創意跟積極的動力只能投注在孩子身上。此種對於母性是女性唯一擁有的創作能力的假設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因為它是一個以小孩為中心的理論。所以母親總是既不可或缺卻又沉默的他者，只要一個女人成為母親，她就被視為再也沒有創作的慾望跟動力去創造出小孩以外的事物。這使女人被迫在寫作與母親身分做選擇，而無法同時兼顧兩者。

此外，在文藝創作等同父權體制，且筆桿象徵陽具的前提下，傳統觀念儼然視寫作為一種絕對的，若非先天決定的，男性活動與成就。基於此種意識型態，寫作或者更廣泛來說是藝術，常與母職相互衝突，女性必須在創作與母職之間作抉擇。「渴望成為藝術家的代價」是高昂的——她必須選擇拋下孩子抑或放棄寫作，南西·

格貝爾（Nancy Gerber）在《母親藝術家的畫像》中辯稱：「對中產階級的母親來說，性別主義的偏見與實行常阻撓母親從事創作」（Gerber, 2003: 12-13）。母親作家經常遭受忽視與禁聲。在〈當我們全然醒悟：以書寫再現〉一文中，芮曲（Adrienne Rich）談到：「欲發揮母性終日和稚子相處，需要的是幻想的抑制與擱置，並以保守的作風取而代之；……女人依照習俗、試圖服從傳統女性的職責，這與具顛覆性的創造力起了正面的衝突。」（Rich, 1979: 43），在《屬於出生的女人》（*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一書中，芮曲亦論及：「有時某人會問我：『妳不曾把妳的孩子寫入詩中嗎？』我那一代的男性同輩確實把他們的小孩——尤其是女兒——寫入詩中。對我而言，詩作存在於當我不為人母、能為自己而活的地方」（Rich, 1986: 31）。又，「直到最近為止」，據T. Olsen（1983）觀察，「舉凡所有傑出的文學成就，幾乎都源自沒有子嗣的女人」（50）。

然而，在如此的性別意識型態下，仍然有些女性主義論者認為母親身分對文學創作反而可能是有所助益的。Jeremiah（2003）曾提及，母系書寫牴觸了其他所謂的母親形象，例如：公 / 私領域、心智 / 身體……都牽涉到母親生活經驗的公開化，……顛覆了母親作為固有和純粹人體存在的傳統信念，進而挑戰了主流標準的個人性與自主性。因此正如母系書寫打破並解構母親作為私人與沉默的規範標準，它也同時對公認的創作敘事產生擾亂並反擊，尤其是自由人文主義者所關注的主體性及創作者身分。她並主張，基於相關性、互惠性與親密性，寫作相對於自由人文主義觀點中的創作，更加接近身為母親的角色：閱讀與寫作牽涉到某種涉及其他人的想像

關係的投入，某種在策略上可能與母性思考的構想產生聯繫的過程，……也就是它們形塑了可以激勵出主體性的相關模式……然後進而挑戰並克服西方資本主義式的個人主義。因此，她的總結是：身為母親的角色也許不僅能與藝術相容也更像是通向藝術的導體，而此個觀點相對的建構了一種顛覆的策略，一種可以除去同時支配著母親角色跟寫作結構的策略。

Alicia Ostriker亦寫道，母親身分對於一個女性藝術創作者的好處在於：母親身分使她接觸到立即且無可避免的生命經驗：死亡、美好、成長與墮落。如果這名女性藝術創作者被教育成認為母親所涉及的各項事務皆是瑣碎且與生命中的重要議題無關，特別是與文學創作主題無關的話，那麼她就該超脫她所接受的教育。此種教育其實是個謊言，除了對女性有不正確的觀念，它還保護並延續了偏好暴力與死亡而非愛與生命的思想體系。

無疑地，艾莉絲·沃克這位曾獲普立茲獎的非裔美國女作家的創作生涯，代表了一位女作家尋求母職身分認同的最佳寫照。她的作品中所反映的對母親身分的不同觀點，實際上更顯現出母職論述中意識型態上的轉變。沃克的小說內容往往與社會和歷史相關，也因此她的小說表現出20世紀黑人女性對於母職的衝突與矛盾。沃克強調主流社會對黑人母親的限制，身為母親的黑人女性如何受到種族與性別雙重歧視。沃克對於母親主體性的再現，突顯了非裔美籍女性為了讓她們在美國歷史中一直被忽視的存在與被壓抑的創作活動重新被看見及聽見，必須不斷反抗壓迫她們的父權與種族階層。沃克顯然沒有在她的小說中大力讚揚母親的偉大，因為她並不認可將母職浪漫化的意識型態觀念，同時，她也不認為女性的自我建構

僅僅來自於養育孩子以及對孩子的渴望。相反地，以非洲為中心的母職理論專家描述，她的小說代表了對於母職複雜且經常矛盾的態度。本文將闡述她的母職經歷如何形塑其個人的創作生涯：透過書寫母職，她重新定義黑人母職並解構母職與書寫的二元對立。

二 另類母親——《美麗蒂安》

沃克對母職的觀感和其創作生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她的寫作生涯可追溯至就讀大學時代，當她的創作能力逐步受到師長及同儕的肯定與鼓勵時，卻面臨了人生前所未有的難題。1965年暑假，沃克前往非洲實習，巧遇她的前男友David DeMoss，也因此意外的懷孕了。當她得知自己懷孕時，陷入極度的沮喪，她才21歲，這是她在 Sarah Lawrence college 最後一年就要大學畢業了。為了不讓她的家人和朋友失望，她必須做出不得已的決定。孩子的父親雖然極力反對墮胎，但沃克還是堅持她的決定。當墮胎在美國還是違法時，窮困且未婚的黑人女學生是別無選擇的。沃克回憶當年的無奈：「不是我就是小孩，我們其中一人是無法存活下來的」（White, 2004: 112）。如果無法成功墮胎，她寧願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在她的枕頭下總是藏著一把刮鬍刀，最後，沃克在許多朋友的協助下如願墮胎。弔詭的是，墮胎似乎使她重生，於是她日以繼夜的寫作，寫下內心的痛苦掙扎——「自殺」這首詩（White, 2004: 114-115），也寫下了第一篇短篇故事〈To Hell with Dying〉（White, 2004: 119），並以《曾經》（*Once*）這本詩集開始她的寫作生涯。

1968年沃克爲了使她的丈夫免於參戰，決定懷孕生子。在沃克完成她的第一本小說之後3天，她的女兒，羅貝卡，誕生了（1969年）。小孩的出生，喚醒了她心中潛藏已久的恐懼：害怕她的生活將有所改變。沃克曾說：「唉！我非常恐懼，且懷疑我的自我分裂至何處？損失爲何？……以後我不能成爲作家了嗎？」（White, 2004: 182）。1972至1973年間，沃克離開密西西比18個月，任教於Wellesley大學以及位於波士頓的麻薩諸塞大學。在這段期間，她克服了爲了寫作而離開女兒的罪惡感，開始書寫《美麗蒂安》（*Meridian*, 1976）。沃克首次在自己的作品《美麗蒂安》記錄了她處在母職與自我生涯規劃之間的衝突與矛盾的心情。透過書寫母親的罪惡感，沃克反思了長久以來對於黑人母職的觀念，當她與這種制度對抗時，也企圖瓦解黑人母職的神話，呈現了母職的多樣性。

非裔美國女性的母職制度可以追溯至非洲文化對母職的觀感。在〈黑人女性和母職〉一文中，柯林斯曾道：「本質上，黑人母職是一種矛盾的制度」（Collins, 2000: 195）。一方面，黑人母職受到極大的尊重，因爲對於大多數的非洲人來說，它「象徵著創造力和傳承」（Collins, 1991b: 214）。且在非裔美國人的社區中，它「代表著成熟和身爲一個女人職責的履行」（Collins, 1991b: 219）。柯林斯也注意到母職能給黑人女性自主的潛能：透過母職，她們可以學習並得到「自我定義」、「自我依靠和獨立」、以及自我尊重（Collins, 2000: 176）。因此，許多非裔美國作家經常頌揚黑人母職。但另一方面，黑人母職也是由多重的壓迫與不公建構而成。柯林斯提及諸如「黑人褓母」和「領救濟金的母親」等刻

板形象，皆是主流父權社會建構出來，用來壓迫和控制黑人女性。即使是在非裔美國男性作家的作品中，看似正面的「超強黑人母親」形象，也壓迫著黑人母親（Collins, 2000: 174-176）。換言之，黑人母親必須過著「犧牲奉獻的生活」，而這種生活已經被視為一種「規範」（Christian, 1997b: 232）；再者，黑人母職已儼然變成一種職責。柯莉斯蒂安一語道破被歌頌的黑人母職背後的真相，及其中的矛盾性：「在理論上，社會推崇母職，但實際上，它拒絕將個別的母親視為有需求和慾望的人」（Christian, 1997a: 87）。透過美麗蒂安一角，沃克拒絕此種被理想化、強調自我犧牲的黑人母職。

在《美麗蒂安》一書中，沃克呈現給讀者的女主角是一位將自己的兒子送給別人領養以拒絕母職的黑人母親。讀者也許會問：一位黑人母親是如何且為何願意放棄自己的小孩？在她身上發生了什麼事？她的故事應該如何被解讀？許多評論家認為美麗蒂安是為了公民權運動才離棄了她的孩子，其實這樣的文本解讀是有點不太正確的。實際上，美麗蒂安早在她獲得Saxon大學獎學金之時就已放棄了朗狄（Rundi），而不是當她自願參加家鄉的投票者登記計畫時才離棄的（在這個時期，她的岳母似乎願意整天照顧這個嬰孩）。美麗蒂安自己從來都不認為想要參加公民權運動的慾望是她決定離棄孩子的原因。另一種說法則認為，美樂蒂安離棄孩子是為了自我的追尋，因此這本小說常被視為女性成長小說。在女主角追尋自我的過程中，母職被視為一種阻撓的因素（McDowell, 1993: 168）。然而，我認為美麗蒂安對母職的抗拒主要起始於她處在黑人母職迷思環境中的無力感。對此，在呈現一連串引人爭議的行為

之時，沃克使角色所遭受到的生活侷限狀況更加明顯。事實上，社會總是藉著約束母親的個人發展來「懲罰」她們的母職。沃克不僅挑戰普遍的神話，也擴展了對於母職的定義。她認為母親的意義不應只侷限於生理層面。母性指的是一種文化現象而非只是一種生物性層面的事件。在我藉由沃克的文本來探究母性議題的討論中，「母親身分」所具有的「母性」並不只代表文本中敘述者與她孩子「們」之間的遺傳關係，因為這些字彙也意味著一連串延伸到生育、扶養與教育孩子之外的文化期待與社會關係。同時也有效的批評在西方文化中，父權制度將母親身分詮釋為一種社會機制的觀念。

基於缺乏來自父母對青春期一些潛在危險行為的警告，美樂蒂安17歲時便發現自己懷孕了。她因此中途輟學且結婚。美樂蒂安很快便發現婚姻和小孩和她的自我意識的建立有所衝突。雖然她不是很清楚她所想要的生活是什麼，但她清楚地意識到婚姻和小孩並非是她所要的。標題名為「快樂母親」的章節揭露了美樂蒂安與黑人母職的內心掙扎。身為一位年輕的妻子與母親，每個人都認為她是「完美的女人」。事實上，她近乎行屍走肉一般。當其他人都以為她把心力專注於孩子身上時，她其實在想著各種殺害自己和她兒子的方式。美樂蒂安拒絕扮演所謂「快樂母親」的完美角色，「幸福」在她眼中只不過是個毫無意義的符號。對她而言，母職「就像是奴隸制度」，她兒子宛如「沉重的枷鎖」，因此，她照料孩子「不是出自於她的慾望，而是因為她兒子的哭號」（Walker, 1976: 69）。當她發現有機會去亞特蘭大唸大學、實現自我時，她犯了一個黑人社群裡的禁忌——她離棄了自己的小孩。

美樂蒂安決定逃離母職的困境，主要是因她見識到母職對女性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在她成長的過程中，美樂蒂安顯然的受到她母親的影響。她的母親希爾太太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她不僅盲目遵循傳統，更無法理解美樂蒂安爲了追尋自我的內心掙扎，且認爲面對此種掙扎只要單純地倚靠信仰。在「你偷過任何東西嗎」（Have You Stolen Anything）章節裡，美樂蒂安思考她母親的一生和她母親與孩子們的關係。雖然她的母親婚姻美滿，但她認爲她並不適合母職。她並不應該有小孩，因爲扶養小孩使她失去自我。希爾太太曾是位老師，然而，當她被母職束縛之後，就失去了獨立以及創造一個有意義的人生的可能性（Walker, 1976）。她不僅失去了自我，並蓄意地「透過對孩子冷漠和缺乏關愛，消極地抗拒母職」（Warren, 1999: 188）。而她想法縝密的女兒認爲她爲了基督教與母愛的付出而放棄了自我。爲此，美樂蒂安不僅憤怒也感到內疚，並且覺得自己的誕生也是禁閉住母親那道牆的其中一塊磚。沃克寫道：「由於剝奪了母親的平靜生活，粉碎了母親剛萌生的自我，使美樂蒂安最初感到罪惡，雖然她很難理解這怎麼會是自己的錯……當她母親連看都沒看她一眼便問，『你偷過什麼東西嗎？』一陣寂靜頓時籠罩在美樂蒂安身上，甚至有一瞬間她覺得自己動不了。這個疑問確實困住了她，讓她疑惑不已。」她感覺自己是母親奴役制度下的一部分，而這種感覺和身爲一位年輕母親的她所認爲母職就是一種奴役的想法不謀而合。母親的無我的母職經驗促使美樂蒂安對黑人母職制度的懼怕，因爲希爾太太正是那「黑人母職的具體呈現」（Walker, 1976: 96）。

不同於她母親那一代的黑人女性，她活在有更多選擇的時代。